

70
YEARS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1949-2019

新中国70年
优秀文学作品文库


中国当代重要小说
分年评介

A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JOR
NOVELS IN DIFFERENT YEARS

马振宏 / 编著

第一卷

No. 1

 中国言实出版社

70
YEARS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新中国70年
优秀文学作品文库

本书是一部记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重要小说发展脉络的“大事记”，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各年度发表的产生一定影响小说的作者、内容进行了简介，对小说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等进行了简评，并将70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撰写了概述，梳理了当代重要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和展示。全书对当代重要小说的全局性、整体性观览，为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当代重要小说创作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1949-2019

新 中 国 70 年
优 秀 文 学 作 品 文 库

中国当代重要小说
分年评介

A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JOR
NOVELS IN DIFFERENT YEARS

马 振 宏 / 编 著

1

第 一 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重要小说分年评介 / 马振宏编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10

(新中国 70 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

ISBN 978-7-5171-2930-1

I . ①中… II . ①马… III . ①小说评论—中国—当代
IV .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1844 号

出版人: 王昕朋
策划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张 强
文字编辑: 赵 歌
出版统筹: 冯素丽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柒拾叁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88 印张

字 数 1338 千字

定 价 238.00 元 (全三卷) ISBN 978-7-5171-2930-1

作者简介

马振宏

副教授。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学术研究成果三十余篇，参编《大学语文》一部（任副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发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中篇小说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短篇小说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中国当代重要小说分年评介》

马振宏 编著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散文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诗歌卷》

李少君 主编

第一卷概述

S U M M A R Y

一、“十七年”时期的小说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周扬在大会上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最权威的诠释，明确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工作者应当遵循的创作方针和方向即“解放区”文艺创作路线，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设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我国的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的主题由于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普遍表现的是“歌颂/揭露”的思想倾向：新中国成立初期把新华颂、英雄颂、劳动（建设）颂作为基本主题，突出歌颂与教育功能，在真实性与倾向性中，强调倾向性；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景象，许多作家创作出一批干预生活和描写日常生活琐事，描写亲情、友情、爱情的小说，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文革”前，颂歌与战歌相融合，不仅对新政权和现行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和歌颂，而且通过作品宣扬了斗争哲学，把反帝、反修、反封建作为主题，把反对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旧文化等作为主题。

“十七年”时期，小说自身的文体发展很不平衡，创作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人很多，而创作中篇小说的人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鲜明特点。短篇小说之所以繁荣，一是因为它能迅速地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为现实服务；二是与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文艺思潮的演变有很紧密的关系。中篇小说虽有一定的数量，但成绩并不突出。长篇小说容量大，能满足人们表现丰富的人生经历的需求，也与很多作家想通过长篇小说创作来实现创作“史诗性”作品的追求有关。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紧接着的“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对短篇小说的冲击很明显，但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损害程度要轻一些，但1963年之后，长篇小说繁荣的局面又受到了阻扼。

“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们纷纷被各级“文联”“作协”等文学组织吸纳，因此，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也被高度地组织了起来，其小说创作主要书写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和当时“火热”的生产、斗争、生活；由于过分重视写什么，以至于怎样写却被轻视了，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在题材上主要写革命斗争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人新事。

在书写历史题材时，强调书写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事情，主要表现革命斗争的胜利史，从而达到对过去的革命和当时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以使人们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证明新社会的真理性，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的准则和思想的依据等。创作手法采取现实主义方法，纪实品格明显，常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具有作者参与战争的自传色彩；强调民族化风格和大众化的英雄传奇色彩，风格雄浑、庄重，普遍具有昂扬的革命精神和朝气；政治色彩浓烈，体现了政治的要求、导向，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这种情况后来演变为“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追求“史诗性”风格，即内容上要揭示“历史本质”，结构上要寻求宏阔的时空跨度与规模，着眼于重大革命历史事实的重现，突出革命英雄的形象创造，体现革命英雄主义的基调，比如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及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追求；追求“诗意化”表现，艺术处理上力求使生活故事诗意化，英雄形象抒情化，形成诗化小说，比如峻青、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就是如此；创作方式是“组织生产”的方式，即在选定一个特定的革命战争历史事件后，组织一定的创作力量来集体创作，以突现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的精神，比如《红岩》就是“组织生产”的产物；“处理题材”时不是充分地通过故事的叙写来实现“革命本质”的表现，而是更多地凸显了小说家自我的个人化的情思意绪，比如《青春之歌》就是如此。

书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具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一是反映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小说。短篇小说方面的有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和《七根火柴》、胡万春的《骨肉》、马识途的《找红军》等；长篇小说

方面的有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劫人的《大波》、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山菊花》、马忆湘的《朝阳花》、李建彤的《刘志丹》、秦兆阳的《两辈人》、陈立德的《前驱》、马识途的《清江壮歌》等。

二是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短篇小说方面的有刘白羽的短篇小说集《龙烟村纪事》、孙犁的《山地回忆》、峻青的《党员登记表》、白刃的《血战天门顶》；中篇小说方面的有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刘盛亚的《再生记》、管桦的《辛俊地》等；长篇小说方面的有周而复的《燕宿崖》、孔厥和袁静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那沙的《骨肉亲》、王林的《腹地》、马烽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师陀的《历史无情》、孙犁的《风云初记》、李克和李微含合著的《地道战》、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杨大群的《小矿工》、冯德英的《苦菜花》、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刘流的《烈火金刚》、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晓明和韩安庆合著的《平原枪声》、克扬和戈基合著的《连心锁》、张孟良的《三辈儿》、赛时礼的《三进山城》、李晓明的《破晓记》等。

三是反映解放战争的小说。比如孙犁的短篇小说《嘱咐》、刘白羽的小说集《战火纷飞》、朱定的短篇小说《关连长》、孟淑池的短篇小说《金锁》、峻青的短篇小说《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等；草明的《原动力》、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沈默君的《渡江侦察记》等中篇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陈登科的《活人塘》和《淮河边上的儿女》、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冯德英的《迎春花》、萧玉的《高粱红了》第一部《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罗广斌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等长篇小说是代表作。

另外，也有书写古代历史的小说。比如师陀的《出奔》、蒋星煜的《海瑞的故事》、程小青的《高士驴》、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等历史小说都是这方面的名作。

这一时期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具体又有以下几类：

一是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如沙汀的短篇小说《到朝鲜前线去》、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中篇小说《上甘岭》、路翎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李準的短篇小说《妻子》、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等。



二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这类小说主要描写了农村土地变革（土改）、生产方式变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及“文革”前的中国农村社会状况，表现了农村社会“深刻的变化”现实。同时，少数作品也在表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劳动情况时，描写了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们多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体验生活，然后用被农村现实改变了的立场、观点、情感去描写农民、反映农业生产状况。这期间形成了以赵树理为轴心的“山西作家群”和以柳青为轴心的“陕西作家群”，同时出现了备受关注的“浩然现象”。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再进行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描写土地改革后农民观念变化的小说。比如赵树理的短篇小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登记》《求雨》、孙犁的短篇小说《正月》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谷峪的短篇小说《新事新办》、方纪的短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和中篇小说《三年早知道》、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秦兆阳的短篇小说《农村散记》、骆宾基的短篇小说《王妈妈》、周立波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卜春秀》和短篇小说《山那面的人家》、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妯娌》、峻青的短篇小说《苍松志》、张行的长篇小说《武陵山下》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二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比如李準的《不能走那一条路》和《李双双小传》、骆宾基的《夜走黄泥岗》、师陀的《前进曲》和《胡进财的故事》、端木蕻良的《钟》、康濯的《春种秋收》、沙汀的《卢家秀》和《风浪》、王汶石的《风雪之夜》、周立波的《腊妹子》、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的《里程》等短篇小说，赵树理的《三里湾》、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于逢的《金沙洲》、胡正的《汾水长流》、欧阳山的《高干大》、康濯的《东方红》等长篇小说和柳青的中篇小说《狠透铁》是代表作。

第三是描写“大跃进”时期农村现状的小说。比如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和《张来兴》、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西戎的《赖大嫂》、柯蓝的《三打铜锣》、周立波的《霜降前后》等短篇小说，王汶石的《黑凤》、草明的《乘风破浪》、陈登科的《风雷》等长篇小说以及韶华的中篇小说《浪涛滚滚》是代表作。

第四是描写两条道路斗争的小说。比如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实干家

潘永福《互动鉴定》、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沙滩上》、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刘真的短篇小说《长长的流水》、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等是代表作。

三是反映工业题材的小说。这类小说的内容涉及多方面的情况。比如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写某电厂工人孙怀德等对日本侵略者投降时破坏了的电厂进行保护、维修，终于使电厂发出了强大的电力，使城市、工厂、农村一下子大放光明。康濯的长篇小说《黑石坡煤窑演义》写新中国成立后，技术很高、性格爽直的工人张大三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使昔日的煤窑恢复了生产的故事。萧军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写某煤矿为了支援全国的解放，开展了献工活动。张弦的短篇小说《甲方代表》反映了一名热情、向上、年轻的上海姑娘白玫投身到中国工业建设战线中去的故事。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以20世纪50年代修建宝成铁路为背景，描写了筑路工人积极投身到祖国铁路建设事业中去的故事。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描写了辽南钢铁公司炼钢厂工人秦德贵及其他人积极为国家炼钢的故事，其间也描写了阶级斗争情况。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描写了民族资本家徐义德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残酷剥削工人及采取多种手段和人民政府对抗，但最后还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面前悔过自新，加入了公私合营队伍之中。另外，胡万春的中篇小说《特殊性格的人》《内部问题》、唐克新的短篇小说《沙桂英》、白危的长篇小说《垦荒曲》、欧阳山的短篇小说《金牛和笑女》、李季的短篇小说《脊梁吟》等都反映了工业领域内各种各样的情况。

四是少数民族题材小说。这方面的小说也书写了多方面的内容。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讲述了党和政府对云南边区苗族、哈尼族人民的支援。李乔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描写了凉山彝族人民在解放初期的生活与斗争，第二部《早来的春天》描写了凉山地区1956年的民主改革运动，第三部《呼啸的山风》描写了在彝族干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我人民解放军顺利粉碎了国民党残部勾结反动奴隶主发动的叛乱的故事。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描述了蒙古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及由这一革命所建立的新政权、新社会，做出了合法性的证明。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讲述了农技工作人员在西藏更达坝子建立农业站，推广农耕新技术、新设备的故事，其间也讲述了他们与阶级敌人的斗争情况。高缨的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写在



1956年，工程队老技师任秉清在凉山尼古拉达人民公社社长马赫家里见到了失踪多年的女儿达吉，最后，马赫让达吉认了自己的父亲，任秉清也搬进了马赫的家。从此以后，达吉与两个父亲愉快地生活在了一起。杨大群的长篇小说《彝族之鹰》写与奴隶主有杀父之仇的彝族少年阿鹰幻想着飞向天空，做个自由的人。新中国成立后，阿鹰成为新中国的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阿鹰英勇作战，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另外，刘澍德的中篇小说《桥》、徐怀中的短篇小说《松耳石》、贺政民的长篇小说《玉泉喷绿》、李乔的短篇小说《杜鹃花开的时候》、孙健忠的短篇小说《“老粮秣”新事》书写的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

五是少量干预现实的小说。这些小说以直面现实的精神，大胆地干预现实，勇敢地揭露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批判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比如，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讲述了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青年人林震被调到新单位之后不被接纳的情况，激烈地批评了党委机关里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刘绍棠的短篇小说《田野落霞》描写了北运河平原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通过区委干部之间的矛盾纠纷，反映出有的干部滋生了腐败现象，尖锐地批判了县、区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白危的小说《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展现了一个昔日作为标杆的农业社遭遇的困境，这困境多来自上级的瞎指挥、强迫命令等，尖锐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权腐化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和管理方式等。李国文的短篇小说《改选》虽然歌颂了作为劳动人民的代表郝魁山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但也讲述了他的工会主席职务一点一点失去及被工人们重新选上之后死在了选举现场的悲惨事情，批评了官僚主义、任人唯亲等不良现象。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杨老太爷》讲述了杨老太爷对儿子的前途横加干涉的事情，批评了有严重私有观念的干部家属。

六是表现人性、爱情、亲情的小说。比如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海河边上》《我们夫妇之间》、孙犁的短篇小说《看护》、艾芜的短篇小说《夜归》、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浩然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亲家》、蓝珊的短篇小说《爱的成长》、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丰村的短篇小说《美丽》、茹志鹃的长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和短篇小说《静静的产院》、刘真的短篇小说《英雄的乐章》、李準的短篇小说《耕云记》、李云德的长篇小说《鹰之歌》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七是写和平时期转业军人和现役军人的小说。比如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描写了十万转业官兵开发荒原雁窝岛、建设农场的生活。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描写了和平时期我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一名普通战士的成长经历。

另外，欧阳山的5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之《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反映了从1919年至1949年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填补了以小说形式反映南方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空白。羽山、徐昌霖的长篇小说《东风化雨》描写了主人公王少堂从20世纪30年代经营的橡胶厂遭受日本侵略者及官僚势力的层层盘剥的情况，被一些人看作是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的翻版。慕湘将军的四部曲长篇小说《新波旧澜》第一部《晋阳秋》讲述了“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太原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第二部《满山红》叙述了共产党员郭松等开辟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的故事。第三部《汾水寒》描写了1938年八路军120师离开山西去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时，阎锡山借机大搞反共摩擦的事情。第四部《自由花》描写了郭松率领八路军开赴晋西北，与日军正面作战，结果惨遭敌人杀害的事情。

“十七年”时期，创作小说的作家和创作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剧本的人一样，都经历了多次“文学运动”的“洗礼”。1951年5月20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文学运动“《武训传》批判”运动开始，接着又是批判《红楼梦》（1954）、批判胡适文学思想（1954）、批判胡风文艺思想（1955）、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5—1957）、批判“写中间人物论”（1964）、批判《海瑞罢官》（1965）等“文学运动”，使作家们的创作受到很大影响。王林创作的长篇小说《腹地》在1949年9月由新华书店刊行后，因为写了因伤致残的八路军战士辛大刚和一家剧团的演员白玉萼相爱的事情，1950年被禁，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遭到批判的长篇小说。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海河边上》因为讲述了大男如何为了和女青年小花谈恋爱才追求进步的故事，也遭到了批评。朱定的短篇小说《关连长》写解放军某部的关连长带领大家攻打敌指挥所，当他发现里面有数百名孤儿时，放弃炮攻，改用白刃战。小说发表后，一些人认为它“歪曲”了解放军的形象，在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时，该小说及同名电影继续受到了批判。孟淑池的短篇小说《金锁》写流浪汉金锁参加了解放军，一些人认为“人物不真实，侮辱了劳动人民”，使主张刊发它的赵树理接二连三地在《人



民日报》《文艺报》上检讨。刘盛亚的中篇小说《再生记》描写一对逃难的孪生姐妹被迫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培训。结业之后，姐姐成了革命者，妹妹则成了国民党的职业特工。姐姐为了革命牺牲后，妹妹通过参加我方医院的护理工作获得新生。一些人认为该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模糊了敌我界限，歪曲了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的形象，作者屡遭批斗后被错划为“右派”，受迫害而死。前面提及的创作出干预现实和表现人情人性小说的作者中，有不少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被流放、劳动改造或被投进监狱。另外，《血战天门顶》（白刃）、《洼地上的“战役”》（路翎）、《田野落霞》（刘绍棠）、《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狼透铁》（柳青）、《战火中的青春》（雪克）等许多作品也都受到了批判。更为荒诞的是路翎创作的短篇小说《初雪》因为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兵刘强和助手王德贵在朝鲜战场上执行任务时，一个战士怀里抱了一个朝鲜儿童，一些人便认为这个行为体现了两个战士的头脑里存在着“纠缠不清的想法”，小说随即被彻底否定。

“十七年”时期，作家们都有创作出史诗性作品的追求，因此一些小说确实也塑造出了一些典型的人物形象。从艺术表现形态上看，作家们基本都以社会运动、风俗变迁、人生历程、革命英雄传奇为叙事内容。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存在的缺陷也很明显：一是文艺政治化，人们普遍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简单、机械的理解，把文艺当作表现政治、革命、战争的工具，让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二是题材单一化，主要围绕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和当时“火热”的生产、斗争来创作，忽视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三是手法为单一的现实主义，片面追求大众化、民族化，用文学去图解历史、政治，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使作家的创作个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四是人物多为扁平化、类型化、模式化的人物，在塑造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时，常按照英雄就是彻底的英雄，反面人物就是彻底的反面人物的原则去塑造，很少出现性格组合式的复合型人物。中间人物也不被提倡。五是作家非专业化，许多人是“一本书作家”，他们只借助自己熟悉的历史和生活去写作，普遍缺乏文学创作的素养，难以进行长期的创作。

二、“文革”时期的小说

“文革”时期，进行小说创作的人几乎没有“文革”前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作家几乎都在“文革”前后休笔，文坛上消失了他们的身影。

浩然在“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都很活跃，他在“文革”前的小说创作形成了“浩然现象”。1964年，浩然在《收获》第1期发表了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1965年，在《北京文艺》第11期发表了《艳阳天》第二卷的部分内容；1966年，在《北京文艺》第1—2期和《收获》第2期发表了《艳阳天》第三卷的部分内容。1972年5月，浩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4年5月，第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二卷出版后，各地累计印行了大约600万册之多，并被翻译成日、英以及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小说也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第三卷创作完成后，部分章节在《人民文学》和《北京文艺》等杂志连载、选载，但最终未出版。第四卷创作完成后，也未出版（1994年，京华出版社将三、四卷和一、二卷进行了出版）。1973年，浩然出版了四部短篇小说集：《幼苗集》（4月）、《七月槐花香》（4月）、《春歌集》（6月）、《杨柳风》（8月）。1974年6月，浩然的长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约10万字）出版；11月，《西沙儿女——奇志篇》上卷（约20万字）在《北京文艺》第6期发表。11月，《西沙儿女》整部小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9月，浩然的中篇小说《百花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英儒在195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战斗在滹沱河上》，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好评。1958年在《收获》第6期发表了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11月，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0年初，李英儒被投入秦城监狱后，失去自由达8年之久。在狱中，他在家人送来的一套《资本论》上，用牙膏皮的底角，蘸上墨水创作了《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两部长篇小说。

黎汝清在“文革”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万山红遍》（上卷）。古华、张抗抗、张长弓、贾平凹、叶蔚林、谌容、蒋子龙、刘心武、陈忠实、孟伟哉、姚雪垠等在“文革”时期走上文坛，新时期成为更加著名的作家。除了上述作家，“文革”期间走上文坛的大多数人在“文革”结束后消失了身影。

“文革”期间，文学被要求只能写“社会主义建设和斗争”、只能写中共领导的



革命斗争生活，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必须把塑造“正面人物”“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工农兵英雄形象”等作为“中心的”或“根本的”任务；在所有作品的创作中，必须遵循“三突出”的原则。“三突出”原则最早是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来的，受到了江青等人的赞同和推广，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具体讲就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塑造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不允许有思想性格上的弱点等。

从题材上看，“文革”时期的小说涉及了以下类型：

一是爱情题材。这些小说都以地下文学的状态存在着，秘密流传着。比如1968年流传的无名氏（卜乃夫）创作的中篇小说《塔里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很有名望、很有身份的小提琴家罗圣提和一个外交官的女儿黎薇的爱情故事。黎薇最后进入了修道院，把自己封闭在了“精神之塔”中。1970年流传的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讲述了丁洁琼和苏冠兰的爱情。苏冠兰和叶玉菡成婚后，丁洁琼痛苦万分，最后在苏冠兰、叶玉菡的热诚挽留下，她第二次和苏冠兰握了手。小说大胆突破禁区，将视角锁定在知识分子身上，歌颂了人性人情，体现了作者独立的文学品格。毕汝协的中篇小说《九级浪》讲述了“我”的同学司马丽被绘画老师骗奸后，从此走向了堕落的故事。1970年流传的北岛的小说《波动》写了杨讯下乡当知青时偶遇了女孩肖凌，两人彼此相爱。但肖凌曾未婚生过女儿。杨讯的父亲于是拆散了杨讯和肖凌。故事的结尾是肖凌死了。靳凡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写老久、老嘎和真真之间的感情纠葛，真真最后选择了老久。小说描写了一代人在黑暗中对祖国前途的热切探索，对个人情感的热烈追求。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落花梦》写了才子陈洪波和名姝骆小枝同游天国的经历。

二是书写过去战争的小说。第一是描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小说。比如黎汝清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上卷）写了1928年春天到秋天，党领导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南方某山区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故事。李心田的长篇小说《闪闪的红星》讲述了红军后代潘冬子在红军大部队战略转移后，面对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残酷镇压、围剿，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坚持斗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的故事。

第二是书写抗战题材的小说。比如李英儒的长篇小说《女游击队长》描写了八路军游击队女队长凌雪晴领导游击队员与日伪军进行艰苦战斗的故事。前涉执笔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描写了八路军战士赵永生与养妹赵小花、亲妹妹何翠姑（真名也叫赵小花，是游击队女英雄）团聚的故事。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反映了天津汉沽盐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故事。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选《京江怒涛》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江苏民兵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斗争情况。李永鸿的长篇小说《淀上飞兵》写抗战时期，京、津、保（定）三角地区的人民武装白洋淀雁翎队坚持水上游击战，和日寇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浩然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写西沙儿女抗击侵略、保卫西沙的故事，集中塑造了程亮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形象。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的第一部写梁永生走上革命道路以前的人生经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他在与敌对阶级的斗争中总是遭受失败。第二部写梁永生走上革命道路以后，被党派回家乡组织大刀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屡屡取得了胜利。刘云鹏的长篇小说《柳河屯烽火》描写了八路军挺进到冀中平原后，建立根据地，与日军、汉奸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王精忠的长篇小说《万里战旗红》描写了黄继光烈士所在的连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斗故事。

第三是讲述解放战争题材的小说。比如姜树茂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描写了1947年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某岛上的渔民同渔霸与匪特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孙景瑞的长篇小说《难忘的战斗》写了1949年5月，解放军副团长田文中同国民党特务陈福堂之间的斗争。胡学方的长篇小说《威震敌胆》写了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人民解放军组建炮兵，但却没有炮，于是派一支部队到东北找寻日军偷埋的各式大炮的故事。

第四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及解放初期消灭残敌斗争的小说。比如郑直的长篇小说《激战无名川》讲述了我志愿军铁道兵战士抢修大桥的故事。齐勉的长篇小说《碧空雄鹰》讲述了志愿军的一支年轻的空军部队和朝鲜军民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故事。李丰祝的长篇小说《保卫马良山》记录了1951年11月，志愿军战士集中兵力吃掉英美联军驻守在马良山的第28旅的一个边防营的故事。孙家玉的长篇小说《战火催春》写志愿军钢刀团侦察排长龙中青带领侦察员插入敌区，侦察敌情，牵制敌人，最终使中朝联军消灭了美军“王牌”飞甲团。孟伟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第一部）写中朝